

《三国演义》

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

卫绍生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大象出版社



《三国演义》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

卫绍生
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大象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三国演义》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/ 卫绍生著. — 郑州 : 大象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347-8575-7

I. ①三… II. ①卫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②古典小说—小说研究—中国 IV. ①I242. 4②I207. 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7654 号

《三国演义》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

SANGUO YANYI YU 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YANJIU

卫绍生 著

出版人 王刘纯
责任编辑 郑强胜
责任校对 钟 骄
书籍设计 王 敏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16

印 张 22.75

字 数 33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9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毛庄工业园

邮政编码 450044 电话 0371-63784396

卷前絮语

对古典小说的兴趣，是在读大学之前培养起来的。读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正值十年“文革”，古典小说大多被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的“黑货”烧了或禁了，所以只好读那些“当红”的小说。以当时的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，觉得这些小说还不错。偶尔觅得几部古典小说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七侠五义》等，对比起来一读，就有了云泥霄壤之感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1978年第一届全国统考，本人有幸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在校四年，有了便利条件，阅读小说的兴趣得到了满足，古典小说，外国小说，名家的，非名家的，都从图书馆借来读。有的细细读，有的粗粗翻，不知不觉中读了不下百部。那时对小说兴趣颇浓，大学毕业论文选择了《三国演义》作为研究对象，论文题目为《论〈三国演义〉的整体结构特色》。这篇习作后来以“夏炜”为笔名发表在《中州学刊》1984年第4期，并被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《名家解读〈三国演义〉》一书。由此而与《三国演义》结缘。这么多年来，这种缘分一直在持续着，本人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从未间断，但客观地说，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并没有做到全神贯注，而是断断续续，兴之所至或任务所迫的情况更多一些。

关注《三国演义》，自然也要关注整个中国古典小说，从先秦诸子、两汉杂记、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，到唐传奇、宋元话本、明清小说，自然要有所

涉猎，追索其源头，厘清其流变，梳理其发展变化之迹，探究其内在艺术规律，弄明白中国古典小说何以兴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何以能够成为不朽的名著。“小说”一词的发明权属于庄子，《庄子·外物》最早言及“小说”一词，称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”但这里的“小说”是与“大达”对举的一个词，是指无关大道理的琐屑言辞，即荀子所谓“小家珍说”^①。先秦和西汉时期，有不少类似庄子所说“小说”的作品。东汉初年的桓谭对先秦和西汉时期出现的“小说”作过这样的解释：“若其小说家，合丛残小语，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，治身理家，有可观之辞。”^②桓谭的解释比较符合两汉以前“小说”的情况，其表现形式是“丛残小语”，创作方式是“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”，而其思想意义则在于“治身理家”。班固注意到了这种现象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特列“小说家”一派，并把它归于“诸子”之列：

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。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然亦弗灭也。闾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。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。^③

班固给“小说家”的定位是“出于稗官”，是“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”。当然，班固所说的“小说”，既包括子夏所说的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”，又包括桓谭所说的“合丛残小语，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”。总体而言，是指那些篇幅不长、文体随意，且又能讲说一些道理的杂文或随笔式文章，与魏晋以后的“小说”有本质不同。

古典小说的出现，是随着文学的自觉和文体的大备而出现的，其时代大体可以定位在魏晋时期，其标志就是干宝《搜神记》的问世。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把唐前志怪小说分为三个时期，认为先秦是志怪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

① 《荀子·正名》有云：“故智者论道而已矣，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。”

② 李善注《文选》卷三十一江淹《李都尉》诗注引东汉桓谭《新论》。

③ 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。按：班固所引孔子语，实为子夏之言。

期，两汉为志怪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，魏晋南北朝是志怪的完全成熟和鼎盛时期。^①这虽是就志怪小说而言，但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轨迹大体一致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是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形成期和鼎盛期，代表作就是《世说新语》和《搜神记》。这一时期的小说多是短制，属于典型的“丛残小语”，篇幅不长，文体随意，杂记、随笔、语录等，皆可为小说。虽然如此，还是有不少篇章有了故事情节，开始讲究形象塑造、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，而“虚构”作为小说艺术的主要标志已经被广泛使用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可能还显得比较稚嫩，但它毕竟具备了小说的基本要素，已经可以在众多的文体中自为一体。

进入唐宋时期，古典小说的容量开始加大。无论唐传奇还是宋话本，都不再像魏晋南北朝志人、志怪小说那样属于短制，情节也不再是单一的，而且细节描写、人物描写和场景描写已经是很普遍的事儿了。唐传奇和宋话本开始更多关注人物的生活和情感，关注人物所处的社会与环境，关注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，同时还兼顾到环境描写与景物描写。如《霍小玉传》写李益与霍小玉相见：

其夕，生浣衣沐浴，修饰容仪，喜跃交并，通夕不寐。迟明，巾幘，引镜自照，惟惧不谐也。徘徊之间，至于亭午。遂命驾疾驱，直抵胜业。至约之所，果见青衣立候，迎问曰：“莫是李十郎否？”即下马，令牵入屋底，急急锁门，见鲍果从内出来，遥笑曰：“何等儿郎，造次入此？”生调诮未毕，引入中门。庭间有四樱桃树，西北悬一鹦鹉笼，见生人来，即语曰：“有人入来，急下帘者。”生本性雅淡，心犹疑惧，忽见鸟语，愕然不敢进，逡巡。鲍引净持下阶相迎，延入对坐。年可四十余，绰约多姿，谈笑甚媚。因谓生曰：“素闻十郎才调风流，今又见仪容雅秀，名下固无虚士。某有一女子，虽拙教训，颜色不至丑陋，得配君子，颇为相宜。频见

^① 刘叶秋：《古小说的新探索（序）》，见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。

鲍十一娘说意旨，今亦便令永奉箕帚。”生谢曰：“鄙拙庸愚，不意顾盼，倘垂采录，生死为荣。”遂命酒僕，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，生即拜迎。但觉一室之中，若琼林玉树，互相照耀，转盼精彩射人。既而遂坐母侧，母谓曰：“汝尝爱念‘开帘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’，即此十郎诗也。尔终日吟想，何如一见？”玉乃低鬟微笑，细语曰：“见面不如闻名，才子岂能无貌？”生遂连起拜曰：“小娘子爱才，鄙夫重色。两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”母女相顾而笑，遂举酒数巡。生起，请玉唱歌。初不肯，母固强之。发声清亮，曲度精奇。酒阑，及暝，鲍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闲庭邃宇，帘幕甚华。鲍令侍儿桂子、浣沙与生脱靴解带。须臾，玉至，言叙温和，辞气宛媚。解罗衣之际，态有余妍，低帏昵枕，极其欢爱。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。

李益与霍小玉的相见，竟然写得如此婉转曲折，富有声色。而“庭间有四樱桃树，西北悬一鹦鹉笼”，看似闲笔，实则 是以景写人，借物写人，对李益与霍小玉形象的塑造都有“比兴”之功。类似的描写，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难得一见，而在唐传奇和宋话本中，倒是较为常见的事情。可见，到了唐传奇和宋话本，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和人物塑造已臻于完善。

和魏晋南北朝小说相比较，唐传奇和宋话本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地位同样重要，而其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无疑更为显著，尤其是其篇幅的加长和容量的增大，为元明之际长篇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元代出现的《全相评话五种》，是古典小说由宋话本和拟话本向长篇小说过渡的产物。《全相评话五种》皆是讲史话本，每一种皆分为不同的单元，每一单元又由若干历史故事组成。分开来看，是一个一个故事，连缀起来，则是由一条或多条主线串起来的某一朝代历史故事集合。如《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，以司马仲相阴间断案开篇，确定了西汉至三国因果业报的主线，这就是“仲相断阴间公事”一节中所说：“汉高祖负其功臣，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。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，交彭越为蜀川刘备，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，交汉高祖生

许昌为献帝，吕后为伏皇后。交曹操占得天时，囚其献帝，杀伏皇后报仇。江东孙权占得地利，十山九水。蜀川刘备占得人和。刘备索取关、张之勇，却无谋略之人。交蒯通生济州，为琅琊郡复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道号卧龙先生，于南阳邓州卧龙岗上建庵居住。此处是君臣聚会之处，共立天下，往西川益州建都为皇帝，约五十余年。交仲相生在阳间，复姓司马，字仲达，三国并收，独霸天下。”在这样一个因果业报的故事框架下，三国故事尽入其中。但读者读起来，缺少那种一气呵成、欲究其竟的快感。究其原因，则是《三国志平话》尚不具备长篇小说丝丝入扣的叙事艺术和结构特征。长篇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出现，则把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虽然迄今尚无定论，但一般认为成书于元明之际，且其作为中国第一部古典长篇历史小说，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。它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，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正是由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成功示范，其后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小说名著才得以陆续问世，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令许多读者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的形象塑造、景物描写、艺术结构、叙事方式、语言艺术等大为赞叹。正是这些作品取得的非凡成就，令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学样式中赫然独立，成为与诗歌、散文、辞赋、散曲等并列的一种文学样式，才有了文学史上的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的说法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：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：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代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^①王国维不曾说到小说，但小说事实上成为明清时期最为发达、影响也最大的文学样式。关于这一点，只要看一看清代禁毁小说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。

中国古典小说何以会招致当权者的禁毁呢？除所谓的“诲淫诲盗”和鼓动暴民造反等原因外，更重要的是小说表达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指向对寻常百姓有

^① 王国维：《宋元戏曲史·自序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。

潜移默化之功，给统治者禁锢人们的思想、约束人们的行为造成了很大的不便。可是，中国古典小说从其产生之日起，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与当权者唱对台戏，而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试图维护所谓的“正统”，包括思想的、文化的和政权的“正统”。有的小说记载愤激之语和愤激之事，也是在特定环境下出现的，都有其“规定情景”。譬如《水浒传》写梁山好汉打家劫舍、占山为王、扯旗造反，那也是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更何况，梁山好汉后来都接受了招安，成为朝廷对付其他农民起义的重要力量。作者让梁山好汉“反贪官不反皇帝”，把握住了最后的底线。所以，《水浒传》对当权者来说，是帮忙而不是添乱。《金瓶梅》在明清两代是以“海淫”的名义被禁的，但如果站得高一点，对所谓“海淫”的细节描写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，而会从中发现其真正的价值。毛泽东曾这样评价《金瓶梅》，说“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，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，《金瓶梅》是写得很细致的”。他认为，《金瓶梅》“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。暴露了封建统治，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，也有一部分很仔细。《金瓶梅》是《红楼梦》的老祖宗，没有《金瓶梅》就写不出《红楼梦》”。^①《水浒传》和《金瓶梅》是反复被禁的所谓“海淫海盗”之作，尚且都有各自的“底线”，对当权者都未造成实质性伤害，那么就更遑论其他古典小说了。可见，对中国古典小说确实有个如何看待的问题。研究者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研究，除要搞清楚小说的作者生平、成书年代、版本流变等相关问题外，更为重要的是对小说的文本研究，包括对小说的思想内容、艺术成就、主要贡献、当代价值、后世影响等进行全方位解读，既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古典小说和古代社会，又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镜鉴。

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标志性之作，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由短制向长篇过渡的标志性之作，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承上启下之作。本人研究方向偏重于魏晋南北朝文学，研究对象又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，但这一时期与《三国演

义》展现的宏大历史叙事和时间跨度正相吻合，研究内容与三国时期的社会、历史、思想、文化等有内在一致性，所以研究范围就自然而然地由魏晋文学扩展至《三国演义》，进而延伸到中国古典小说。这些年来，除与他人合著《中国古典小说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风貌》（巴蜀书社 2002 年）、《三国演义与人才学》（巴蜀书社 1993 年）、《人才与谋略——〈三国演义〉启示录》（台湾书泉出版社 1995 年）等研究专著外，还先后发表古典小说研究论文 30 余篇，其中大多数集中在《三国演义》研究方面。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，早者为 20 世纪 80 年代，迟者为近年所作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文化研究方兴未艾，西方叙事学理论开始传入，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。在此学术背景下，笔者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，一方面注重文本研究，关注《三国演义》的思想内涵、人物形象、创作方法、艺术成就，关注三国故事的材料来源、故事演变及后世影响，关注《三国演义》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与借鉴；另一方面，则更多地偏重对《三国演义》的文化阐释和艺术探索，从文化学视角对《三国演义》进行观照和阐释。时间既久，相关研究竟然累积成帙。今从中选取 24 篇，与其他相关研究文章 6 篇汇为一册，作为多年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一个小结。

本书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，跳出了传统的主题思想、人物形象、艺术分析等研究范式，而是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切入，对《三国演义》的思想内容、人物形象、艺术结构、文化内涵、当代价值等进行深入探讨，既有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式的研究，亦有揭橥实质、探究价值式的研究。所收文章涉猎较广，虽然不成系统，但在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探究上有其内在的一致性。收入本书的其他 8 篇文章，大致可分为两类。第一类是《三国演义》之外的其他古典小说研究，包括《〈搜神记〉成书年代考论》《不一样的隋唐英雄谱》《家族传奇的典范》《北宋忠臣良将的颂歌》《传承的是爱国精神》和《明季世俗生活画卷》等 6 篇文章。这些文章，有的是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，有的是为某一种小说的出版而写的前言，有的是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文章收录时都做了必要的修订，有的则因需要增加了题目。第二类是公开发表的古

代戏曲论文。这类文章有2篇，一篇是《从泛戏剧到戏剧的自觉》，另一篇是《元人杂剧的时空观念论略》，都是研究元人杂剧的戏曲观念的。中国古典小说与古代戏曲是相通的，故而收录进来，置于本书的最后。

中国古典小说是一个“富矿”。有人说，中国古典小说的“四大名著”都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，想从中选一个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就很难。这话说对了一半。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，确实很难找到研究的“空白”地带。但是，如果能够改变一下思路，换一个视角，借助新的研究方法，重新审视那些所谓已经研究“透”了的问题，就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惊喜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把人生和学问分为三种境界：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。‘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’，此第一境也；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’，此第二境也；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’，此第三境也。”^①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，也要经过这三种境界。跨越寻求，超越勤奋，才会有蓦然所得的喜悦。李清照笔下的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之景，虽然冷清孤寂，却是做学问的人必须忍受的经历，必须要有的修炼。没有这种经历和修炼，就幻想蓦然有得，就想大有作为，那无异于痴人说梦，是不切实际的。

笔者198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进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，迄今已经35年了。毛泽东说，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那是伟人气魄和诗人气质。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，其中的甘苦只有真正潜心深入进去，才能品味得到。这种工作需要的是严格细致、深入探究和独立思考，免不了较真、枯燥甚至琐屑，很难浪漫起来。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，紧张、忙碌、辛苦而漫长，难得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不过，回头看一下，这些年的辛苦不是白费，确实是颇有所得，在魏晋文学、古典小说和文化研究等方面，倒也积累了一些成果。本人计划退休前把有关魏晋文学、古典小说和文化研究的

文章整理一下，从中选择一部分，编为三卷，作为这么多年从事专业研究的一个小结。第一卷是关于魏晋文学研究的，名为《魏晋文学的多维观照》，已经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；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是第二卷，主要内容是关于《三国演义》和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，名为《〈三国演义〉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》；余下的是第三卷，主要内容是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研究的，书名暂定为《文化：传统与当代的对话》，计划 2017 年结集出版。

文章甘苦事，得失寸心知。选择了从事专业研究，就应该无怨无悔，更应该乐其所乐、乐其有得，甚至是以苦为乐。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学术研究需要勤奋和付出，舍此之外，没有捷径可走，也很难投机取巧。只有勤付出、多付出，长了见识，有了积累，再伴之以深邃的思考、深入的研究，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，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收获、有所成就。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点感悟，冀与同好共勉。

卫绍生

丙申金秋于郑州

目 录

- 1 古典历史小说的道德取向
——从《三国演义》谈起
- 10 评《三国演义》的天人观
- 20 艰难的二难选择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的妇女观评析
- 30 略论《三国演义》的整体结构特色
- 39 《三国演义》结构体系解读
- 49 《三国演义》草船借箭故事的形成及影响
- 64 从《鼎峙春秋》看三国故事的流变
——以三国故事“连环计”为例
- 76 在演义与教化之间
——论《鼎峙春秋》对三国故事的演绎与改造
- 89 论王粲《英雄记》中的曹操形象
- 100 文化的积淀与再生
——诸葛亮文化现象简论
- 112 诸葛亮躬耕地考辨
- 124 论孙权“割据江东以观成败”战略的得失
- 134 赤壁之战的“桃子”该由谁摘
——论两个话语体系中的周瑜形象
- 146 从诸葛亮三篇祭文看周瑜形象的演变

- 157 孔融:传递正统观念的“过客”
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孔融形象
- 166 三国谋士的谋道与谋事
- 176 巧借术数施妙手
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的术数描写
- 185 《三国演义》与中国酒文化
- 203 《三国演义》的决策理论与实践
- 213 《三国演义》与 modern 管理研究
- 234 新世纪《三国演义》作者之争
- 247 清代花部三国戏简论
- 257 关于三国文化旅游的几个问题
- 269 许昌开发三国文化旅游的思考与建议
- 278 《搜神记》成书年代考论
- 288 不一样的隋唐英雄谱
——《隋唐演义·前言》
- 297 家族英雄传奇的典范
——简论《杨家将演义》
- 304 北宋忠臣良将的颂歌
——《万花楼演义·前言》
- 311 传承的是爱国精神
——《说岳全传·前言》
- 318 明季世俗生活画卷
——《三刻拍案惊奇·前言》
- 325 从泛戏剧到戏剧的自觉
——兼论宋元戏剧观念及其与儒家诗教之关系
- 342 元人杂剧的时空观念论略

古典历史小说的道德取向

——从《三国演义》谈起

古典历史小说作家十分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，在审美创造中积极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和“史镜”作用。从鸿蒙初开以至清代，历史小说都有表现和描述。考察以《三国演义》为代表的古典历史小说，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向，那就是道德取向的一致性。道德取向是古典历史小说之“脉”，从最早出现的《五代史平话》，到《三国演义》，再到后来的历朝历代演义，这个“脉”自始至终一脉相承，绵延不绝。在历史进程和朝代更迭的范式上，在重大历史事件起始原因的阐释上，在重要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上，古典历史小说都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历史道德化倾向。本文从《三国演义》入手，对古典历史小说的道德取向进行探讨，并就教于方家同好。

一、历史演进的道德范式

历史进程的道德范式不是小说家的发明，而是儒家和道家共同创造的。早在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，孔子和庄子就已经用道德的尺度来解释历史的演进，把历史进程道德化了。孔子称赞黄帝、尧、舜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^①，称赞汤、武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看重的就是这些圣贤的人格力量

^① [晋] 韩伯康：《周易注》卷八《系辞下》。

和道德力量。“三皇五帝”等远古时期的统治者，既不是选举出来的，也不是世袭的，而是通过禅让这一途径。他们治理天下，依靠的不是强权和法令，而是个人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。所以，从尧开始，统治者通常考虑的不是如何治理天下，而是如何选择一个有德行的人来接替他们，把天下禅让给那些具有人格魅力和高尚道德的人，这样的故事可谓多多。《庄子·让王篇》对传说中的尧、舜、禹、汤的“让王”作了详细描述。庄子推崇尧、舜、禹、汤等禅让王位的明君，更推崇以许由、巢父等为代表的宁愿接受禅让的高士。从他们身上，人们可以感受到高洁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。历史在孔子、庄子等儒家和道家宗师不经意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种道德范式——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，唯有德者居之。

这种道德范式在历史进入世袭社会以后曾经受到严峻的挑战。世袭制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嫡长子继承，皇帝死了，嫡长子即位，嫡长子若是死了，就由嫡长子之子接替。哪怕嫡长子是个十足的窝囊废，但因其是嫡长子，传位于他是天经地义的。若是废长立幼，就不符合道德规范，就会引起兄弟争斗乃至仇杀，国家就会大乱。所以，在世袭社会，讲究的是嫡长子继承。于是有了第二种范式——嫡长子继承。只有在皇帝无嗣，或是天下大乱、诸侯争雄的情况下，才会把第一种范式“唯有德者居之”抬出来。

上述两种道德范式，对历史小说家演绎历史进程和朝代更替，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影响力。只要是基本上以历史为依据的古典小说，都无法摆脱这两种范式的影响。合乎这两种范式的，就赞扬，就称颂，否则就会受到贬斥。《五代史平话·梁史评话》开篇对“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”称赞一番之后，笔锋一转，写道：“这黄帝做着个厮杀的头脑，教天下后世习用干戈……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皆是以臣弑君，篡夺了夏、殷的天下，汤、武不合作了这个样子。后来周室衰微，诸侯强大，春秋之世二百四十年之间，臣弑其君的也有，子弑其父的也有。孔子圣人为建三纲伦、九法斲，秉那直笔，做一卷书，唤作《春秋》，褒奖他善的，贬罚他恶的，故孟子道：‘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’”汤伐

桀，武王伐纣，是以有德伐无道，所以孔子称作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就是这样顺天应人的事情，在评话的作者看来，同样是以臣弑君，不合乎政治伦理。虽然如此，它却符合历史演进的第一种道德范式。

《三国演义》演绎三国历史，同样接受了这样两种道德范式。汉之将亡，作者首先写桓、灵二帝诸多“失德”之举：禁锢善类、宠信宦官、妇寺干政。所有这些都与“唯有德者居之”的道德范式相矛盾，所以由“失德”而至“失政”，以至于改朝换代，也就是自然而然、合乎情理的事情了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亡国之君几乎都是这个德行。蜀汉后主阿斗、吴主孙皓，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后主宠信宦官黄皓，耽于酒色。大臣刘琰的妻子胡氏十分有姿色，入宫朝见皇后，被后主留在宫中一个月才放出去。刘琰奈何后主不得，就把怒气发到妻子身上，暴打胡氏一顿。后主知道后，立即就把刘琰杀了。孙皓暴虐凶残，沉溺酒色，宠信宦官，奢靡无度。他每次宴会群臣，一定要让他们都喝醉才肯罢休，然后让黄门官纠劾众人过失，若是有人犯了错，就剥其面皮，凿瞎其眼睛，暴行令人发指！西晋都督羊祜闻孙皓失德，曾上表请求伐吴。司马炎准备出兵，却因贾充等人的阻止而作罢。羊祜感慨道：“天与不取，岂不大可惜哉！”后来，他辞官归乡，又对司马炎说：“孙皓暴虐已甚，于今可不战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歿，更立新君，则吴非陛下所能得也。”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求伐吴，他说：“孙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，更立贤主，则强敌也。”其和羊祜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作为一国君主而失德，就会失去民心，失去支持，其结果必然是失政失国。三国归晋，与其说是晋朝君臣的努力，不如说是三国之君因失德而拱手相送。

争夺天下的人，常常借用“唯有德者居之”的道德范式，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一方，以为天下道德尽归于己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十九回司马炎逼魏元帝让位一段，就透露出“道德”二字在争夺天下时所具有的非凡力量。司马炎要篡位，首先拈出“才德”二字，说曹奂没有才德，应该让有才德者来坐天下。黄门侍郎张节驳斥司马炎，也是一个“德”字，以为曹奂“有德无罪”，不能让